

《中国：迈向新世纪》丛书之一

人才摇篮的忧思

——中国教育的转机、问题与对策

● 高洪源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迈向新世纪》丛书之一



人才摇篮的忧思

——中国教育的转机、问题与对策

高洪源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才摇篮的忧思：中国教育的转机、问题与对策/高洪源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8

(《中国：迈向新世纪》丛书)

ISBN 7-5035-1022-6

I. 人… II. 高… III. 教育改革-中国-研究 IV. G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7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5.5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迈向新世纪》丛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丛书》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中有关教育、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社会保障等重大问题，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进行改革，迈向 21 世纪，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资料丰富，论述清楚，提出问题，研究对策，对诸多方面的改革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1994 · 2

前 言

本书应早在几年前问世，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不过世界上从不会因死了张屠户，就吃活毛猪。以后几年中同样题材的著作出了好几本，对各种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也几乎毫无二致，可见大家的心是相通的。

值得庆幸的是，当本书的写作再次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教育发展的背景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经过一段插曲之后，我们的改革大业终于又向市场经济大大地跨近一步，它对教育发展的冲击与推动之大是无法用一两句话形容的。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为目标的教育改革，缓解了一些原有的矛盾，将另一些矛盾引向非传统的方向去寻找出路，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和矛盾，有争议的教育现象几乎每天都在“亮相”，理论上的不同见解层出不穷，教育的发展好象进入了“战国”时代。

教育在改革大潮中存在许多值得忧思的问题。那些离开传统模式的教育现象和教育行为纷纷以无序和随机的面貌出现，给人以不得要领、把握不住的感觉。面对这种局面不必紧张，因为无序后面隐藏着新的有序，随机性也是一定范围内或新的体制下确定性的反映。至于那些把事情推到极端的片面做法，则一方面有其短暂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会随改革的深入而规范化。

本书不是纯教育理论著作，只是力图向读者介绍一些大家所关心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理论、政策，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或许有许多不成熟甚至错误之处。本书参考、借鉴和引用了许多研究者的成果，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责任编辑 曲 炜 崔宪涛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李 灵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曲径寻踪	(1)
一 走出误区	(2)
二 在困境中崛起	(6)
三 “接轨”之争	(11)
第二章 再造生命力	(16)
一 分权的共鸣效应	(17)
二 给学校一个支点	(24)
三 吹皱一池春水	(28)
四 权力的协奏曲	(35)
五 叩响市场大门	(41)
第三章 红杏出墙	(47)
一 田野的希望	(47)
二 走出象牙塔	(54)
第四章 进而趑趄	(65)
一 决口的校园	(66)
二 斩不断的情结	(72)
三 希望之光	(78)
四 探步“伊甸园”	(83)
五 釜底抽薪	(87)
六 争议中的变革	(96)
七 预言与对策	(100)
第五章 礼贤孔方兄	(103)
一 上学也议价	(104)

二	不堪重负	(108)
三	花钱买.....	(112)
四	三手联弹	(117)
第六章	失落的圣贤	(120)
一	在困窘中沉浮	(121)
二	徘徊在无奈与天职之间	(129)
三	危言：师无后乎	(137)
四	走向大师范	(140)
第七章	忧悠学子心	(148)
一	引子：校徽消失了	(148)
二	“海”的诱惑	(150)
三	迫近机遇	(158)
四	孔雀东南飞	(161)
五	残缺的现代性	(168)
第八章	另一方水土	(175)
一	桃李不言	(176)
二	中国的公学	(181)
三	公校中的特区	(189)
第九章	战略之争	(195)
一	六年还是九年	(195)
二	数量还是质量和效益	(200)

第一章 曲径寻踪

1976年，当十月的雷霆永远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恶梦时，中国教育问题并没有马上提到社会生活的日程上来。小学招生了，上课了。中学招生了，上课了。只有大学没有动，它预示着事情很麻烦，有争论。大学的沉寂连同“两个估计”^①的阴影一起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心头。

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明确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提出应尽快恢复高考制度。高考制度的恢复给广大教育工作者透露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个强信号：教育事业没有被遗忘，中国的教育事业还要发展。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详尽地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以及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同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但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②邓小平的讲话站在时

^①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张春桥于1971年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对17年教育工作和我国知识分子的诬蔑。其一为“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其二为“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5页。

代的高度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从而为教育工作者审视教育事业的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全新角度。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的一页。

党的工作重心向现代化经济建设转移了，农村的经济改革开始了，教育该怎么办？教育工作者开始了沉重的思考，之后是教育改革艰难的启动。

一 走出误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教育理论界所做的第一件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就是开展了有关教育本质的讨论。

教育的本质是关于教育的根本属性的问题，即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分开来的最根本特征是什么。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始于50年代初期的前苏联。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后，前苏联展开了关于教育是否是上层建筑以及它的特点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有人认为，教育按其本质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教育既为生产服务，又为上层建筑服务，它同属于两个范畴；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教育与语言一样，既不属于上层建筑，也不属于生产力范畴，教育是一个永恒范畴。这些争论也影响到我国教育界，有些人提出教育是永恒的普遍的范畴，不属于上层建筑。但由于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还占有绝对优势，这场争论不了了之。

中国教育界从1978年开始的这场讨论，酷似当年在前苏联展开的争论。概括起来，大概有四种观点：教育是上层建筑；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一部分是生产力；教育是一

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不能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来归类。

主张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教育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由政治经济所决定的，反过来又为政治经济服务，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有阶级性。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五种主要的经济形态，也就存在着五种社会性质不同的教育，所有这些都说明教育具备了上层建筑的特点。

主张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主要以这样几个理由为据：其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是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它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其二，教育实践的基本方面与生产劳动经验的传递有着本质的联系，教育起源于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生产的关键因素，教育已由生产的条件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教育经济学家认为，对教育的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它可以创造出比物质投资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教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教育活动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即它把属于“一般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传递给未来的劳动者，使他们成为具备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同时教育活动特别是高等教育活动领域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科学技术。凡此种种，都说明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上述两种观点采取折衷看法的人们认为，教育是一种复合的社会现象，具有多质性的特点，既服务于生产斗争，也服务于阶级斗争。教育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以及教育的任务、内容等方面，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反转过来的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中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但另外的教育活动内容，如基本文化知识、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手段等，都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这部分内容应

归入生产力范畴。

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的观点认为，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它既同生产力发展有关，也同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有关；既同科学技术有关，也同语言文字等文化工具有关。因此简单地把它归入生产力范畴或上层建筑范畴，都是不适宜的。教育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社会永存，教育也永存。因此它是列宁所称的社会生活中普遍的永恒的范畴，其本质就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一根本特点将它与其它社会活动区分开来了。

客观地说，这个讨论中还存在着一些混乱。学者们的观点所以不能统一，实际上是论题发生了“漂移”。明明是将“教育的本质”定为争鸣的题目，但更多的人讨论了教育的一系列社会职能、教育的经济职能、教育的政治职能、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职能等等。如果仅仅从学术争鸣的角度看，这种论题的“漂移”或许反映了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在理论修养上的不足。但从另一方面看，论题“漂移”“歪打正着”，它恰恰反映了这次争鸣的社会目的。

酷似前苏联 50 年代关于“教育本质”讨论的这场争论，其背景、其目的、其结果都与那场异国争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前苏联的争论是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论著发表后所出现的一场学者们的书斋对话，那么中国学者的这次讨论则是面对被“文化大革命”摧残得千疮百孔的教育事业的一次反思，是对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后教育事业的历史责任的理论务虚。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中，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教育本质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几乎毫不怀疑地把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命题本身并无根本错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政治就是夸大了的阶级斗争，是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对立起来的“反修防

修”。最终，在“左”的路线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打着“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大旗而摧垮了学校，并以“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将教育与经济建设隔绝开来。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体教育工作者要记取的切肤之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工作要全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也必须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做出战略决策。有关教育本质的讨论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起了振聋发聩的启迪作用，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与经济的结合架起了理论与思想的桥梁。

应该一提的是，在走出“左”的教育思想的误区，为教育与经济关系“正名”的理论潮流中，一些经济学家以他们扎根经济理论的优势和富于远见的洞察力更为实际地阐明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厉以宁先生早在1978年写作的《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欧和美国技术力量形成问题研究》^①一文中，将教育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归纳为五点：

“第一，它向社会提供一支能在科学上有发现、发明，在生产技术上有创新、变革的科学研究和设计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科学技术上至多只能步别国后尘，很难取得重大突破。第二，它向社会提供一支能掌握和运用先进生产方法的技术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即使有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它们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它向社会提供一支适应于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和技术管理人员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就会造成生产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就不能发挥先进生产技术的优越性。第四，它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新产品的推广使用，为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准备条件，同时也为今后技术力量的成长提供广阔的基础，为源源不断的高

^① 《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质量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供给提供保证。第五，它使社会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得以保存和传播，这种传播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累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作为人类共同财富，通过教育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个民族，从这一代传播给下一代。”

在1981年所写的另一篇论文《论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①中，厉以宁又从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入手，提出：“可以依靠发展教育和调整教育结构来解决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可以通过发展高、中等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逐步增加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应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率和职工收入水平；可以通过近期增加教育投入获得中远期财政收入的提高。”经济学家们这些论述，大多为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证实。

方向已经指明。打开现代教育的大厦，让千百万优秀人才源源而出，去创造光辉的未来。

芝麻，开门吧！

二 在困境中崛起

从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算起，已经过去整整15年。这15年中，全国人民和全体教育工作者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在战胜自身的弱点和客观困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以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理顺管理体制，克服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倾向，科学地规划教育发展。

为适应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中央痛下决心进行教育改革，消除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结构及教育思想、内容、方法与

^①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不适应状况。1985年5月27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改革管理体制为龙头，带动教改全面展开。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是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交给地方行使，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同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惨遭破坏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又曾几度重犯不顾实际追求高指标的老毛病。1978年11月6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扫除占全国少年和青壮年人口30—40%的文盲、半文盲。而这部分人口数字在2—3亿。1980年12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国要在8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远远超过了全国近一半地区的实际能力。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较科学地分析了全国的经济、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决定分为三类不同地区，分别于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前后一段时间实现9年义务教育，这一规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改变教育投资体制，扩大教育经费来源，使各级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在十几年的改革中，由于实行了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集资办教育的方针，教育投资的增长比率基本保持在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比率之上。1991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额为731.5亿元，比1980年增长4倍，其中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482.2亿元，比1980年增长3.3倍。从1981年至1991年，全国用于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的资金累计达1065.9亿元，其中708.46亿元是通过社会集资，捐资等多种渠道筹集的。在此期间，全国共新建中小学校舍2.75亿平方米；改造中小学旧房1.6亿平方米；新建、改建的中小学校舍面积约占全国中小学总面积的96%。中小學生平均占有校舍面积由1981年的2.4平方米，增加到1991年的4.5平方米，增长了88%，全国共消除中小学危房423亿平方米，危房比重由1981年

的 15.9% 下降至 1.6%。^①

——义务教育的水平在提高。

1991 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由 1981 年的 93% 上到 97.87%，为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小学在校生的辍学率为 2.35%，为建国以来最低点。全国已有 91% 的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小学的目标，小学毕业生的及格率达 85.8%。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已由 1981 年的 68.5% 上升到 1991 年的 77.7%。^②

——高中阶段教育的结构比例进一步合理化。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等职业教育在 1976 年时已不复存在，形成了单一的普通高中教育，造成一方面千军万马争上大学，另一方面中级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经过十几年的教育结构调整，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招生及在校生比率都大幅度上扬，1991 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87.92 万人，在校生为 240.84 万人；技工学校招生 60.18 万人，在校生 155.6 万人；职业高中招生 125.46 万人，在校生 286.38 万人。招生比重占当年高中阶段招生的 53.8%，在校生比重达 49.2%，普通高中学生数与接受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数比例失调的情况已得到很大扭转。我国中专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在校生人数与大学招生人数及在校生人数之比分别为 1.17 : 1 和 1.1 : 1，我国中级技术人员培养和高级技术人员培养比例失调的状况也有极大改进。

——高等教育的数量和结构与国民经济的需要日趋接近。

1980 年我国有高等学校 675 所，到 1992 年发展至 1052 所。从 1980 年到 1987 年曾产生过增长过快（从 675 所增加到 1075 所）的问题，造成重复建校，规模效益下降，从 1987 年以后已得到控制，没再新增设高校。1992 年本专科招生 75.42 万人，在校生为 218.44 万人，分别为 1980 年的 2.74 倍和 2.67 倍。本专科生招生和在校生比例也有了积极的调整，1992 年本科招生 34.98 万人，

① ② 柳路：《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发生历史性变化》，《光明日报》1993 年 4 月。

在校生为 132.95 万人,专科生招生 40.43 万人,在校生为 85.49 万人,比率分别为 1:1.15 和 1:0.64,比 80 年代初都有了合理的调整。同时,本专科招生的科类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一些社会急需的热门学科得到进一步加强。比如普通高校财经类招生比例由 1978 年的 2.99% 增加到 1988 年的 11.4% 之后,又增加到 1992 年的 16.6%。政法类在同一时期招生比例由 0.25% 增加到 2.12% 又增加到 2.55%。一大批符合市场需要的新兴学科和专业纷纷设置起来,如国土管理、公共关系、房地产管理、文秘等等。总的来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多形式、多规格、多渠道的成人教育迅速发展。

到 1992 年,我国共有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函授学院、高校函授部、夜大学、干部专修科、普通专科班)1198 所,招生数达到 59.17 万人,在校生达 14787 万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71.31 万人,在校生达 174.43 万人。成人高等教育在过去的 10 年中为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培养了专科以上水平的专门人才 93 万人,相当于同期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的 60%。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又培养了 210 万名毕业生,相当于同期普通高校毕业生的 81%。

——普通教育阶段的师资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8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各级教育部门开展了普通教育阶段教师学历达标的培训及教师队伍的调整。1987 年统计,我国小学教师中未达到中师及高中以上学历的达 34.4%;初中教师未达到专科及以上学历的达 67.3%;高中教师未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达 59.9%。经过几年努力,小学教师、初中教师 and 高中教师未达国家规定学历者于 1992 年已分别降到 19.3%、48.2% 和 52.8%。

教育事业的成就为我国在 80 年代经济发展“翻番”做出了巨